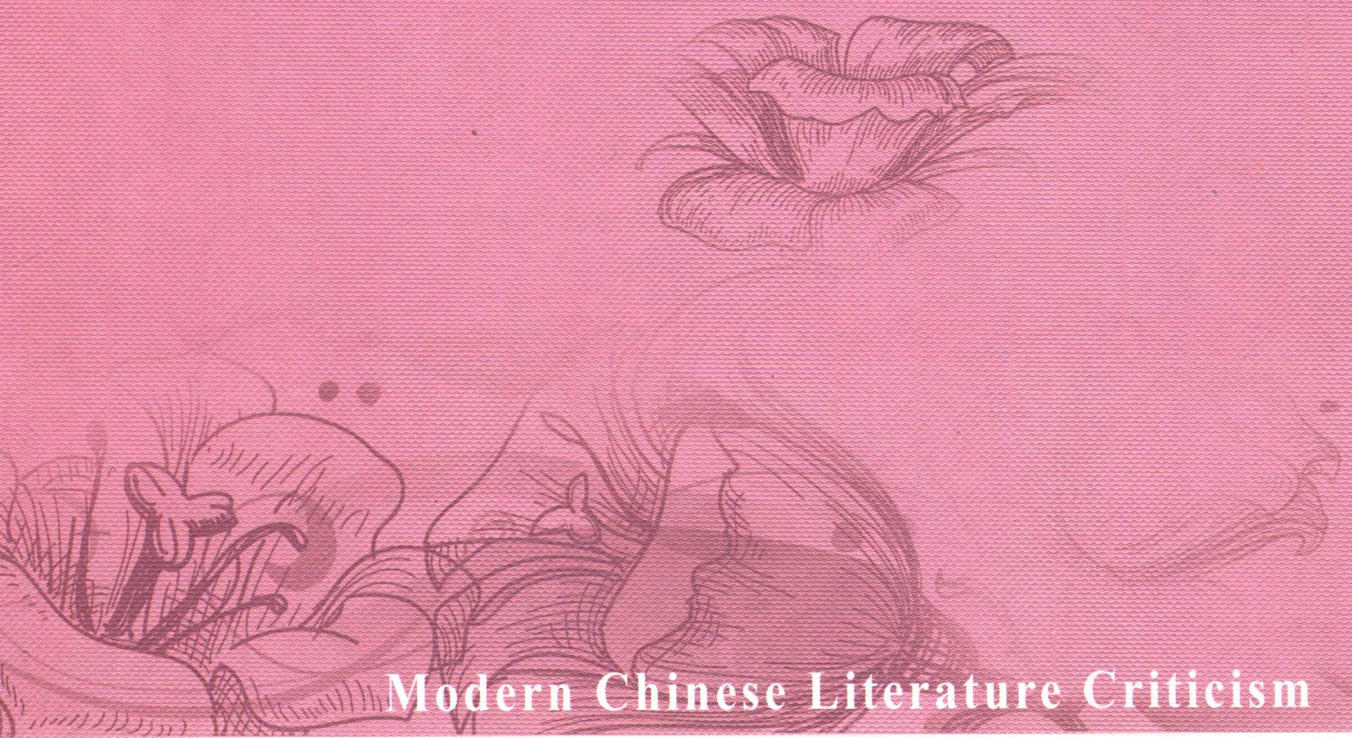


新文学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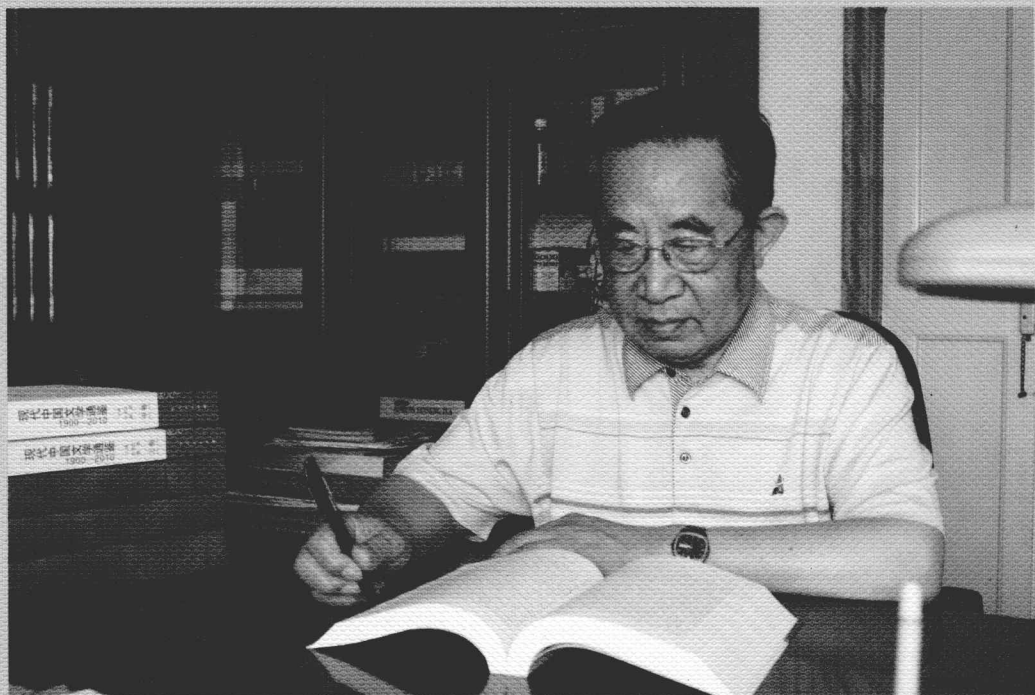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ism

中国新文学学会 主办

- 文学与世相 / 王跃文
- 重审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 诗人档案 / 郑小琼
-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 / 朱德发
- 苏州论坛 / “新文学”传统格局之外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2013 / 2
VOL.2 NO.2



朱德发，1935年生，山东省蓬莱人。1951年至1960年在蓬莱县从事教育工作。1960年被保送至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1964年毕业后分配到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至今。先后担任过山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中文系副主任、山东师范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委会副主任、山东省及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带头人和负责人，现被聘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主要有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长、山东省茅盾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主席团委员等。从1978年参与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后至今，先后正式出版独著、编著（主编著）、合著共40多部，其中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五四文学初探》（1982）、《茅盾前期文学思想散论》（1983）、《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1984）、《中国五四文学史》（1986）、《新编中国现代文学》（1989）、《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1990）、《中国情爱文学史论》（1991）、《20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1992）、《中国山水诗论稿》（1994）、《主体思维与文学史观》（1997）、《跨进新世纪的历程》（2000）、《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2003）、《全球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2004）、《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2004）、《穿越现代文学多维时空》（2004）、《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2006）、《思维的飞翔》（2009）、《现代文学史书写的理论探索》（2010）、《中国现代文学通鉴》（2012）等。曾担任山东省省委宣传部向国庆献礼项目《山东新文学大系》现代部分主编；并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国内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先后获省部级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与文艺评论奖达28项（次）。曾3次获得山东省教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1次获得国家级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于1993年获得国家教委曾宪梓教育基金高等师范教师奖二等奖，2003年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7年荣获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1998年和2001年2次被山东省高工委评为全省高校优秀共产党员，1992年被批准享受国家特殊津贴。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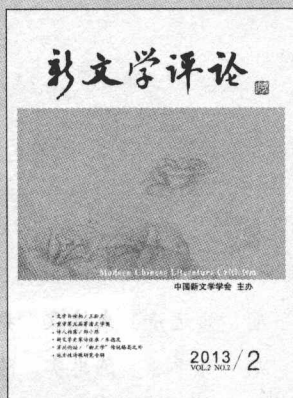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乔以钢
刘醒龙 张 炯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苗得雨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董之林 蒋守谦 舒信波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本朝 王 彬 彬 朱水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李云雷 李少君
李建军 李遇春 吴义勤 何言宏 何锡章
宋剑华 张永健 张 志 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公仲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柳忠秧 施战军
洪治纲 贺仲明 贺 桂 梅 郭宝亮 黄永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 有 顺 熊元义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3/2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文学与世相 王跃文/4

重审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陈晓明/11

直面现实的硬性书写

——论张平的《抉择》 龚自强/14

生逢其时的“另一种史诗”

——从《尘埃落定》看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 何 瑛/22

精灵的落地

——论阿来《尘埃落定》的现代性书写 彭 超/28

“海上梦”的沉沦与挣扎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张 凡/36

论《茶人三部曲》的轮回与恒常不变 张咏宸/42

诗人档案·郑小琼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48

词语的情感 郑小琼/49

“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

——郑小琼访谈 王士强 郑小琼/52

在“权利”与“权力”面前

——论郑小琼 王士强/61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朱德发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设想与思考

——朱德发先生访谈录 朱德发 顾广梅/69

苏州论坛·“新文学”传统格局之外

主持人语 朱栋霖/77

政治意识形态与新文学历史建构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文学史观 胡希东/78

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玉梨魂》 李 斌/89

阴阳五行与金庸“射雕三部曲” 郑保纯/99

文化困境中的艰难叙事

——十七年小说的俗文学叙事特征研究 吉 旭/108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李少君/117

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歌特色

——以甘肃诗人叶舟、古马、高凯的乡土诗为例

..... 张玉玲 张春歌/118

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 杨 梓/123

山东诗歌的现代面貌

——从《册页·新世纪10年山东诗选》看山东诗歌现状

..... 吴玉垒/126

地域与突破

——昭通新诗群论 夏 吟/131

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

——当代湖北诗歌的一个脉络 钱文亮/137

批评前沿

刚性的锋芒与柔情的海

——解读七月的海诗歌的柔性情结 冰 客/143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一人两面:现代新文学家的新诗、旧体诗比较 曾 艳/147

关于当代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思考 刘梦芙/154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表演帝国: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剧 [美]钱 坤/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六)/黄永林,阎志,张永健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22-6133-9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137064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刘 峰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 <http://www.ccnupress.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310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顾 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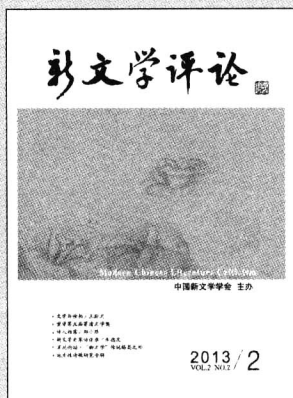
丁 帆 艾 斐 古远清 朱栋霖 乔以钢
刘醒龙 张 炯 陈平原 陈忠实 陈思和
苗得雨 周健明 於可训 胡亚敏 洪子诚
姚海天 顾 彬 黄修己 阎 纲 阎晶明
董之林 蒋守谦 舒信波 温儒敏 熊德彪

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庆生 王本朝 王 彬 彬 朱水涌 刘复生
严 辉 杨 扬 杨 彬 李云雷 李少君
李建军 李遇春 吴义勤 何言宏 何锡章
宋剑华 张永健 张 志 忠 张清华 张新颖
陈公仲 陈晓明 欧阳友权 罗振亚 周晓明
周新民 赵小琪 南 帆 柳忠秧 施战军
洪治纲 贺仲明 贺 桂 梅 郭宝亮 黄永林
阎 志 程光炜 谢 有 顺 熊元义 樊 星



新文学评论

2013/2

编委会主任:王庆生

主 编:黄永林 阎 志 张永健

执行主编:李遇春

副 主 编:樊 星 贺仲明 周新民

编辑部主任:严 辉

编 辑:《新文学评论》编辑部

电子信箱:xwxpl@sina.com

地 址:湖北省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邮 编:430079

主办单位:中国新文学学会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录

Contents ▶

作家语录

文学与世相 王跃文/4

重审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主持人语 陈晓明/11

直面现实的硬性书写

——论张平的《抉择》 龚自强/14

生逢其时的“另一种史诗”

——从《尘埃落定》看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 何 瑛/22

精灵的落地

——论阿来《尘埃落定》的现代性书写 彭 超/28

“海上梦”的沉沦与挣扎

——评王安忆的《长恨歌》 张 凡/36

论《茶人三部曲》的轮回与恒常不变 张咏宸/42

诗人档案·郑小琼

主持人语 张清华 王士强/48

词语的情感 郑小琼/49

“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

——郑小琼访谈 王士强 郑小琼/52

在“权利”与“权力”面前

——论郑小琼 王士强/61

新文学史家访谈录·朱德发

“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建构的设想与思考

——朱德发先生访谈录 朱德发 顾广梅/69

苏州论坛·“新文学”传统格局之外

主持人语 朱栋霖/77

政治意识形态与新文学历史建构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新文学史观 胡希东/78

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玉梨魂》 李 斌/89

阴阳五行与金庸“射雕三部曲” 郑保纯/99

文化困境中的艰难叙事

——十七年小说的俗文学叙事特征研究 吉 旭/108

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李少君/117

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歌特色

——以甘肃诗人叶舟、古马、高凯的乡土诗为例

..... 张玉玲 张春歌/118

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 杨 梓/123

山东诗歌的现代面貌

——从《册页·新世纪10年山东诗选》看山东诗歌现状

..... 吴玉垒/126

地域与突破

——昭通新诗群论 夏 吟/131

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

——当代湖北诗歌的一个脉络 钱文亮/137

批评前沿

刚性的锋芒与柔情的海

——解读七月的海诗歌的柔性情结 冰 客/143

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研究

一人两面:现代新文学家的新诗、旧体诗比较 曾 艳/147

关于当代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思考 刘梦芙/154

中国新文学在海外

表演帝国:五六十年代的历史剧 [美]钱 坤/16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评论(六)/黄永林,阎志,张永健
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ISBN 978-7-5622-6133-9

I. ①新… II. ①黄…②阎…③张…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137064 号

责任编辑:古 沁 冯会平

封面设计:罗明波

责任校对:刘 峰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3426(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网址:<http://www.ccnpublish.com>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310千字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0.5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印次: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文学与世相

◆ 王跃文

先声明两点：一，我是个作家，谈的仅仅是文学话题，或与之相关的社会话题，无关政治；二，我谈的是个人看法，你有权不同意我所说的任何一个字。

什么是文学？我们可以有多种定义。我觉得，文学是人同生活发生关系的方式；或者，文学是人类观察和思考生活的一种方式。

文学是要反映生活的。像很多作家一样，我最初写的当然就是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不经意间，这类小说在中国流行了起来，被人叫作“官场小说”。我本来不赞同简单地用题材划分小说类型，但为了表述的方便不妨借用所谓官场小说的提法。为什么我不同意所谓官场小说的说法呢？因为任何一种简单的类型划分，都会伤害文学的丰富性。如果简单的文学类型划分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悲惨世界》是犯罪小说，《老人与海》是渔业小说，《红楼梦》是青春小说，《西游记》则是玄幻小说。

任何文学都不会是从天下掉下来的，而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官场小说的诞生有其必然性，简单地说就是官场太受人关注。不过，当文学如此关注官场，且是以批判为主的关注，必然是社会某些方面出问题了。

中国人把政界和泛政界都叫作官场，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官场”是个贬义词。《现代汉语词典》对官场的解释是：“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我想如果要把官场特点概括得全面一点，至少还应加上贪污腐败，目前它是首当其冲的特点。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公权部门，也就是宽泛意义上的官场，越来越显示出其词典意义上的官场特点，被民众密切关注着。在老百姓眼里，官场的边界比传统意义上范围大得多，凡是拿纳税人的钱发工资的部

门、行业、单位都被老百姓看作官场，其间的从业人员都被看作官员。我认为这不是老百姓在概念上犯了糊涂，而是这些吃财政饭的部门、行业、单位及其从业人员越来越暴露出其官场面目。这说明，人们潜意识里都是用贬义的眼光看待官场和官场中的人。

官也是个贬义词。不管词典如何解释，官不是正式用来称呼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名词。正式的称呼是干部，细分为公务员、党务工作者、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虽然军队里偶尔有“官兵”之说，但这也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1949年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取代“官兵”二字的是“指战员”。“官”这个字，同“衙门”、“官僚”字词等为伍，事实上已是贬义的。

我记得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官场上开始叫领导为“老板”。我听起来很突兀：领导干部怎么成了老板呢？“老板”也是一个自1949年起就已经死亡的字，因为它指的是私营企业的财产所有人；或旧时候称有名望的戏班演员也叫老板。1949年之后，私有企业主消亡了，而且其政治成分是剥削阶级；演员也叫文艺工作者了。所以，“老板”这个词不用了。可是，我们开始叫领导干部为“老板”，是否意味着领导干部权力所在的范围就是他的私人所有？一切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数？下属都是只能在上级面前俯首帖耳的雇员？下级在上级面前只能仰人鼻息？事实上正是如此。

近十几年，官场开始叫领导为“老大”。叫领导为“老大”，问题就更大了。老大是什么？老大通常是指黑社会头子。说句题外话，据说不光官场上叫领导为“老板”、“老大”，大学里学生叫老师，特别是硕士生、博士生叫导师都是这么叫的。显然，社会各部门、各行业的官场化，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1949年以后，“老板”和“老大”的词性色彩都

是非常不好的，说白了就是贬义的，甚至是黑色的。官场里流行的“老板”和“老大”之类的说法，实际上是对官场“家长制”、“一言堂”、“江湖气”、“帮派气”等特征的描述。这些都说明，管理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权部门的性质在发生令人忧虑的变化。

中国人对官和官场的心态是相当复杂的，几句话难以说清楚。一方面，人们对官场不满。中国自古就有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传统，而现代生活中有些官员的不良表现以及司空见惯的官场丑闻更让老百姓产生仇官情绪。另一方面，人们对官场又是艳羡的。做官毕竟是尊贵的，官场利益是巨大的。官场对社会资源的控制甚至垄断，决定了它是这个社会里利益最大的所在。不管人们对官场有多大的意见，但官场又是人人向往的地方。大学生走向社会，首选往往是考公务员。如果人们都是怀着服务社会的公益之心而去考公务员，当然是国家之幸、民众之福。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利益机制的驱动。仍是那句老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每逢公务员考试，报考者如过江之鲫，场面火爆到令人恐怖的地步。很多年轻人不理解我当年的选择，问我：我们大学生梦寐以求的是考公务员，您当年为什么要从公务员队伍里面出来？我无言以对。

目前中国社会积累的矛盾太多，老百姓的怨气太多，社会问题太多，社会隐患太多。如果要问，目前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总根源在哪里？我说在官场。理由简单说来是两条：一是官场是负责社会治理的，治理不好，难辞其咎。中国人的方方面面都被政府管着，我们从生到死，一举一动都被管着。但是，我们只是被管，没有被服务。所以，看上去国家什么都管，事实上什么都不管。二是官场种种消极腐败现象直接导致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场风气不好，必然影响社会风气。做企业如果必须通过行贿才能办事，最轻的后果是把贿赂费用打入成本，最终让消费者埋单；官员如果贪污腐败，企业自然不会讲诚信；官员如果索拿卡要，商人当然要坑蒙拐骗；老百姓看到官员是贪官，他们不会争做模范公民；如果天天在电视新闻里表演亲民、表演廉洁、表演勤勉的官员，原来是个伪君子 and 腐败分子，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唾沫横飞的政治许诺。

正因为现实如此让人关注，官场文学才如此发达兴旺。当然，我们也听到许多对官场文学的批评和指责，除了来自官方的，还有来自学术界的，责备其艺术品质不高，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想，中国文学界，特别是文学批评界，对官场文学的轻慢和鄙薄，丝毫动摇不了官场文学的存在地位。某种意义上讲，任何流派、任何类型的文学现场，都只是文学史上的某个过渡期，因而，对当下官场文学良莠不齐的指责，不可看作否定官场文学的足够理由。百年之后，我们后人回望这段文学史的时候，看到的必将是另外一番风景。

我是一个被严重误读和误解的作家。有的以为我传授官场秘笈，有的以为我宣扬潜规则，有的说我的小说是教科书。这统统是对我小说的误解。事实上，目前中国火爆的官场文学都面临这种误读和误解。尽管，由于有些作家文学素养等多方面原因的影响，有些官场文学作品存在种种不足，但整体上看中国官场文学并不是有些人误解的那样不堪。关注现实的作家们总体上讲都是有责任心的，他们热爱这个国家并希望它越来越好，才会提起笔来写作满怀责任感的文学作品。我不认为离现实生活越远的文学，才会是艺术性越好的文学；文学干预生活，必然导致艺术品格降低，这种论调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恰恰是作家的怯懦和文学的堕落。

因为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我往往会在演讲题目和具体内容间偷换概念。我想在这里把题目缩小，谈谈自己的小说，并以自己的小说为例，探讨一下官场世相。可以说，官场世相，千奇百怪。我从自己的小说中归纳了如下几点。

1. 厚黑。李宗吾先生的“厚黑”二字，其实把官场特点讲尽讲全了。但是，有些善良或无知的读者，不能接受我小说的描写。我经常会受到一种批评：你的小说太阴暗了。有的人甚至认为我故意丑化了生活。我无非是正视了严酷的现实，这是我文学目光的冷峻。说个真实故事。2005年6月26日，《潇湘晨报》发了一位外地读者的文章：《向王跃文道歉》。原来，我在《国画》里写到有个地方，每当上面有大领导来视察，当地政府就把要饭的、看相算命的、瞎子、跛子、疯子等等他们认为有损市容的人统统骗上

车，拉到同外地交界的偏僻山区去，又骗他们下车，车子掉头返回。当这些有损市容的人再回到原地，太平盛世的大戏早演完了。年复一年，一直如此。令人心痛的是无人为此上访，无人为此告状。这些贫穷无助的弱者被欺凌、被戏弄，皆成自然之事。有一次，政府又这么运送所谓闲杂人员时翻车了，车上的人无一生还。有位读者看了这个情节，骂我太歪曲生活了，给现实抹黑。六七年之后，他在报纸上看到南方某省正是这么做的。这个地方为了整治市容，把7名乞讨人员送到邻县的荒郊野外，致使5人“失踪”。这位读者觉得当年错怪我了，专门写文章到湖南的报纸上发表，向我表示道歉。据说一位可怜的母亲，因为自己未成年女儿被人强奸而拦了领导的车，居然被劳动教养，真是天理难容！这些正是现实中的“厚黑”。

《国画》中的朱怀镜，虽然是善良厚道的，绝非大奸大恶，但他圆滑自私、趋利避害、投机钻营、玩弄权术、没有信仰、没有原则，也没有真正的道德感和正义感（很多官员嘴上讲信仰，其实是没有信仰的，权力才是他们唯一的信仰）。朱怀镜仅仅是不主动做坏事，在不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做点好事，有时候也被迫违心地做点坏事。但就是这样一位官员，小说中人人把他当朋友，视他为知己，他自己也以官场清流自居，虽然有时也自责和暗自忏悔。读了《国画》的官员们，很多愿意以朱怀镜自居，有些不以耻，反以为荣；老百姓甚至以为官员能像朱怀镜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这不仅是老百姓把所谓好官的标准放得很低，更是我们国民看人的道德标准本来就很低。现实生活中，往往一句“人之常情”，可以消解一切原则、道义、是非，这就是我们民族性格中很糟糕的东西。朱怀镜是一个很典型的厚黑者，却被人们如此宽厚地接受。

2. 荒诞。现实官场是很荒诞的，写这类题材的作家，应该具有对荒诞生活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我的小说不乏对现实荒诞性的描述，这不是我有意为之，而是生活本身给我的启示。荒诞体验是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反思和感悟。揭示荒诞是为了反抗荒诞，而不是接受荒诞、承认荒诞，或者仅仅只是玩味和调侃荒诞。《国画》里皮市长在洪灾修复工程现场

被老太太感动，就是个非常荒诞的故事。皮市长看到一位白发老太太在修复水利工程的工地上劳动，马上迎上去问：“老人家，您多大年纪了？”老人家没有回答他的话，只说：“感谢党，感谢政府！”皮市长接过去老太太的担子，亲自参加劳动。皮市长走向这位老人的时候，当地干部可吓坏了。因为老人家是个疯子，她只是喜欢凑热闹，讲上两三句清白话就会胡言乱语。可是，这位疯子可把皮市长感动得不行，他每到一地都会深深地感叹：“多好的老百姓，多好的群众啊！”中国人有个毛病，不管平时如何牢骚满腹，只要对着电视镜头就习惯于说假话。我们正常的人尚且如此，何况这位老太太真是个疯子。这就是生活中真实的荒诞。

我的中篇小说《也算爱情》写的是“文革”故事，虽不是纯粹的官场小说，但同政治有关。工作队员李解放在劳动的时候放了一个响屁，喊了一句口号，就被跟他相好的女工作队长吴丹心揪出来现场批斗。场面很荒诞，很滑稽。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文革”期间，我们县里财政局有个姓张的干部，下到农村劳动时，正是放了一个屁，喊了一句口号：“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结果，这个人坐了三年牢。因为放一个屁而坐三年牢，这种事情只有在荒诞的中国才可能发生。

我的短篇小说《天气不好》里，干部小刘因为一个没有打出来的喷嚏，眼看到手的提拔泡了汤。小刘从厕所里出来，碰见县委书记也来上厕所。小刘刚准备同县委书记打招呼，突然想打喷嚏了。可是，他的喷嚏僵在脸上半天打不出来。他按自己过去的经验，想让强光刺激一下，就会打出喷嚏。于是，他抬头望着天。不幸的是天上没有太阳，是个阴天。小刘这么处理自己喷嚏的时候，县委书记从他身后进厕所去了。小刘被吓坏了：不妙，得罪书记了。今天正在开常委会，小刘的提拔问题提交讨论。因为一个没有打出来的喷嚏，小刘的提拔暂时搁下了。影响干部提拔的竟然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见小公务员的命运是何等卑微。这个细节写的虽然是个偶然事件，揭示的却是官场某种令人无限感慨的必然。生活中的这类荒诞，细想会让小人物欲哭无泪。

我的中篇小说《没这回事》整篇就是个荒诞故

事，其实这是个寓言。史家世代代视如命脉守护的铜匣子，原来空空如也。史老太爷把这个铜匣子交给谁都不放心，先交给大儿子，再交给二儿子，最后交给女儿史仪。儿女同女婿违背家规偷偷地把铜匣子打开了，发现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史仪同她丈夫把这个铜匣子复原，仍要世代代传下去。他们甚至相信，自己不是第一次打开空匣子的人，但世代代都在守护一个谎言。人人都看穿了毫无意义的荒诞，却要心照不宣地维护并坚守下去，这就是中国的某些历史真相。

《苍黄》里写“差配”干部刘星明在选举的时候突然疯了，有人说这不真实，其实也是有原型的。我家乡某县有位乡党委书记，突然有天觉得自己是个县领导了。他每天西装革履，腋下夹着公文包，在县委大院里走来走去，逢人就热情地握手，吩咐几句工作。人人都知道他疯了，却都没有点破，配合他演小品。《苍黄》里的刘星明，发疯的时候讲真话，清醒的时候讲假话；反过来讲，讲真话时就是疯子，讲假话时就是正常人。

西方有学者说中国作家不擅长写幽默和荒诞，其实中国真是个充满荒诞的国度。我有篇小杂文，叫《匪夷所思》，记录了媒体报道过的几件事，都是荒唐透顶的。谁写小说这么虚构，肯定被指为不真实。某地为了绿化荒山，一劳永逸，不惜耗费巨资，在水泥里和上绿色颜料，铺满整座整座的山头。你站在远处，像孙悟空那样手搭凉棚打眼一望，但见山山冈冈，尽披绿装。某地为了迎接农村初级卫生达标检查，不准农民在自家新修的厕所里拉屎，得等到上级领导视察过后才能使用。可是领导们日理万机，左等右等就是不来。农民要上厕所了，只好扛把锄头去野外挖坑。某地发展小城镇，规定临街面房子必须建三层楼以上。有的群众没钱建那么高的楼，那不行。怎么办呢？政府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善解人意，允许群众先建一层或两层，但临街面的墙必须建到三层以上。于是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空心楼”。临街面看上去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而高墙后面却是空空如也。这些杰作，既不是愚人节玩笑，也不是三岁小孩胡闹，更不是谁吃饱饭没事干瞎编的段子，而是那些被叫做人民公仆的某些国家干部认真研

究、大胆决策的。“焦点访谈”曝光了的，该不会弄错吧。这正应了王小波的那句话，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

上面讲的这几件事都是央视“焦点访谈”公开曝光的。中国天大地大，怪事多多，怎能都上“焦点访谈”？见诸报端的怪事仍有不少。某地农村冬种，农民根据田垌的水系流向和各自习惯开沟沥水。乡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大发雷霆。因为农民们开出的沟既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又没有整齐划一，影响美观，必须返工。农民不从，因为开沟是为了沥水，不是为了好看。书记便强令农民必须服从乡党委的决议。正是俗话说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农民最后只好认输，按照乡党委统一要求，重新开沟。新开的水沟必须一律同公路垂直。最后县里领导来检查，坐在小车里放眼望去，条条水沟直得像刀子切的，油菜、小麦叫水沟分割成整齐的块儿。太漂亮了。县里领导高兴了，这个乡被评为当年冬种先进典型。乡党委书记在县里冬种总结大会上介绍经验，农民们却在背后骂娘。

某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不准农民种粮食了，说要种蔬菜。农民很听话，就种蔬菜吧。上面派工作组来检查，却发现有的农民种的蔬菜不是他们指定的品种。这下可触犯天威了。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把农民地里的蔬菜全给毁掉。有的农民不服，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说，我们帮你拔掉劣种蔬菜，你还得付我们工钱哩！我想这是哪家王法？从前只听说旧中国有流氓打了人之后，还要被打的人付手工费。农民最后总是没有办法的，只好按上面意图改种上面指定的优良品种。可是见收之后，所谓优良品种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增产增收。农民们找谁去？又只好背后骂几句娘。

某地是闻名遐迩的牛奶之乡，老百姓因为养奶牛，稍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政府领导就躊躇满志了，自以为造福苍生，功莫大矣！于是耗资亿万，修建了一条牛街，以彰政绩。满街便是石雕奶牛、牛角图腾及同牛有关的艺术杰作。修牛街的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等筹资举措，各地都有经验，最为典型是什么“几个一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社会募一点，群众交一点。话说得漂亮，其实无论哪“一点”，最后都会万流归宗，“点”到

老百姓的腰包里。这是闲话，单说那牛街吧。当地百姓很气愤，说每到晚上，见满街石牛，鬼影幢幢，就恨不得砸了它们。原来政府有钱修牛街，却没钱兑付养牛户的牛奶款。有的养牛户不得不含泪卖掉奶牛。政府领导却洋洋自得，说过了五百年，这大草原也许消失了，留下来的石牛却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那些聪明的公仆，他们脑子里怎么尽是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他们做的桩桩件件，都像愚人节玩笑。为什么我们生活中，特别是官场生活中有这么多的荒诞？什么是荒诞？词典里的准确解释是：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想想这个词的意思，我们就恍然大悟了。我们正是生活在一个极不真实、极不近情理的境遇中。

3. 微妙。《现代汉语词典》对“微妙”这个词的解释是：深奥玄妙，难以捉摸。这正是中国官场的特点。小说要写透官场，须对其中微妙之处做精微的观察，纤毫毕现的描写。比方说握手，很有学问。握手的松紧，主动或被动，握或不握，时间的长或短，双手还是单手，都体现的是某种微妙心理。

我在《国画》里写到的皮市长，就是一位做事故作神秘的人。这种形象我们在官场里会经常看到。他们走路踱着方步，说话哼哼哈哈，举止缓慢，面无表情。不适应的下级，你到了他面前就禁不住屏住呼吸。他们到了他的上级面前也许会借机表现自己的口才，当然会是适可而止；但在下级面前往往金口玉牙，沉默寡言。中国现在尽管也有能说会道的官员，但很多时候他们不太说话。正式说话时念稿子，平时一般是哑巴。有人说，美国的官员是嘴巴喊上去的，中国的官员是装哑巴装上去的。官场老手都深谙含蓄之道，凡事注意象征意义。他们个个是象征主义大师。有年某省的省领导喜欢玩折扇，下面市州领导看出风向的就人人一把折扇；有时候看到领导用了什么茶杯，自己也马上换上什么茶杯。这就是象征主义，表示自己紧跟领导。我在《国画》里专门写到所谓“换杯风波”，正是对官场某种微妙意味的描述。日本人做过一个研究，把会场各种人物的表情动作记录下来，发现会场里最权威的人讲话时摸摸鼻子，下面很多人会下意识地摸鼻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上级对下级的影响是有心理学基础的，这很可悲。一个领导把

自己的亲信派到下面去做官，他要表示支持，一般会说任何话。他只需到亲信做官的地方走走，周围人就明白了。

我在《国画》里写了很多官场人处事的微妙细节。有个细节经常被人提起，就是朱怀镜到柳秘书长家里送礼，柳秘书长非常客气。可是朱怀镜出门之后，站在门口大声地讲客气话，柳秘书长把脸一沉，砰地关了门。朱怀镜弄得一头雾水：刚才还客客气气啊！原来，他出门之后就应轻轻地扬扬手，悄悄地走掉。这种微妙之处，我的小说里随处可见。不是我故意在小说里玩心机，而是中国官场实在是太微妙了。也因为在这种微妙的环境里待久了，中国官场的人都有些神经兮兮。领导说了一句话，下面人都要琢磨：这是什么意思？中国文字及汉语表现手法又很复杂，有字面意义，有言外之意，有双关之意，还有字缝里的意思。

4. 尴尬。“尴尬”的词典解释是：处境困难，左右为难。其实这个词实际上的意义，比词典的简单解释要复杂、细微得多。官场中人，尽是尴尬人。自己说是人民公仆，老百姓并不这么看，岂不尴尬？官场中人所谓事业，不管自己嘴上讲得如何冠冕堂皇，实际上就是做官、做大官。那么，尴尬也来了。若把做官当理想，官场尽是尴尬人。毕竟能按自己愿望做官的人太少。平时要小心处理各种关系，冷不防也可能陷入尴尬境地。

《苍黄》中的李济运，替县委书记刘星明解难，找自己的同学来做选举的“差配”，但老同学疯了。他一片好心，结果既害了老同学，又让县委书记不高兴。这是尴尬。李济运是县委办主任，而县长明阳同他关系很好；他想同明阳走得近些，却又担心县委书记有看法，就连自己同县长一起走路都怕县委书记看见。这是尴尬。《天气不好》里，我写了自己买下了那条大鲤鱼。这篇小说中的小刘，因为买了一条按官场等级而不应该属于自己的鱼，内心非常尴尬，且很惶恐。终于，当政府办主任表扬他工作不错，将会提拔的时候，他把这条熏得黄里透红的腊鲤鱼送到了办公室主任家。可几天之后，小刘发现这条腊鱼又挂在了县长家的阳台上。原来，办公室主任拿了这条鱼心里也不安。

我的小说也不尽是官场小说，生活也不只是官场才有尴尬。我们谁都会处于尴尬，荒诞的生活充满尴尬。《平常日子》中，一对普通夫妻因为儿子学习成绩好，受到市长的接见，孩子的父亲姚天明立即成了单位里的红人。单位领导以为他同市长关系好，请他找市长替单位办事。姚天明不便多做解释，硬着头皮领了任务，却又不敢去找市长，陷入尴尬局面。后来市长因为腐败问题被“双规”了，他找市长的尴尬被解除；但他又陷入新的尴尬。因为怕伤害儿子的感情只得瞒着儿子，说市长伯伯在新闻里看不见了是他出差了。这也是尴尬。孩子妈妈吉月信佛，但自从市长给儿子题了字，便把佛龕取下来而挂上市长的字。后来，只好又把佛龕安上去，点上三炷香，两手合十，缓缓地跪下。

5. 虚伪。我刚参加工作时，有回陪领导出差，临时因车误点，在车站看了一场电影。每当有暴露镜头出现的时候，这位领导就啧啧几句：思想性太差了！因为他是领导，不在我面前说这句话，面子上不好过。当他说过无数次“思想性太差了”之后，电影完毕，灯光通明，我发现这位领导因为过于激动而脸上油光光、汗津津。这时候，领导不得不说了句：艺术性还不错。这个故事让我看出，官场中人是多么虚伪！这仅仅是官场中人身上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多官场中人，时刻都在演戏，因太进入角色，都到了自己也不分真假的地步。一位官员同我吃饭时，问我：小王呀？你抽烟怎么样？我这里还有几支烟，你拿着，也许对你的创作有好处。我相信他这么表演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电影里看到的伟人形象，已经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演戏了。而我看到的却是一个假人。他完全忘记自己是谁了。他送我的那几支烟，似乎就是当年大人物送给劳动模范的芒果。

《西州月》中的孟维周，从地委书记的秘书，做到地委书记（市委书记）。最初做秘书时，当他所服务的领导张兆林由副书记提为书记，司机听说张书记要换车换司机，就求孟维周帮忙，想留下来继续跟着张书记。孟维周知道张书记没有换掉司机的打算，却在司机面前故弄玄虚。一件本来不存在的事，叫孟维周弄得一波三折，叫司机不安了好几天，最后感谢孟维周帮了大忙。孟维周正是因为具备了虚伪这种品

质，比同辈年轻干部都升得快。

官场中人的虚伪，有大虚伪和小虚伪。自己都不理解、不相信的堂皇口号，天天挂在嘴上喊着，这是大虚伪；日常工作中的口是心非，三面两刀，虚与委蛇，这是小虚伪。大虚伪误国，小虚伪害人。

6. 悲凉。我觉得，官场是上演人性悲剧的地方。我开头就说过，官场是个贬义词，其中突出的特点就是虚伪、欺诈、逢迎、倾轧、贪污腐败。从这些特点上说，官场无疑是人性悲剧的策源地。由于这个原因，我小说的情感基调是悲悯的。处境的艰难、人性的扭曲，等等，都决定了这是个悲剧所在。作家须对人性有深刻认识，对人性复杂性有了的洞察，对人性弱点与局限性有深刻体察，进而在此基础上有对人类悲剧命运的同情、理解和哀伤。人性是复杂的，作家不能对人性作简单化的理解和简单化处理。

简单地说，不管是小说中的好人坏人，正面反面人物，我对他们都是怀着同情的。尽力去写出一种悲凉，体现作家的悲悯情怀。《西州月》里的关隐达，一位正派、能干的官员，因为是地委书记陶凡的女婿而飞黄腾达，又因为岳父退休而仕途受阻。他知道从此之后，自己只能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在各县之间调来调去，然后落下一双疲惫不堪的红眼睛，一个松弛的大啤酒肚。我写这样一个人物，是因为见过很多这样的官场失意者。关隐达后来因为人大代表自动议而成民选市长，他却知道自己会遭遇不平凡的命运。这部小说里写到关隐达的岳父陶凡，一位官声很好的老干部，退下来之后内心无限悲凉，找不到自己的角色，找不到自己的故乡，找不到灵魂依托的地方。晚年，自己唯一的爱好就是书法。听说过去的老下级，如今的省委副书记张兆林会来看望他，在家里兴致勃勃地把书法作品挂得满墙。他像打了强心针一样，天天等着张兆林的到来。但是，张兆林只礼节性地到他院子里寒暄几句，家门都没有进。陶凡非常失落。他更大的可悲是还不敢把这种失落表现出来，他得撑住自己曾为地委书记的风度。

中篇小说《也算爱情》里的吴丹心，满脑子的所谓革命思想，一本正经地玩着荒唐的政治游戏。但是，她内心又充满女性本能的欲望，偷偷地同工作队员李解放相好。为了掩饰自己同李解放的私情，她采

取的是不可理喻的变态方式：晚上同李解放颠鸾倒凤，白天就当众批评李解放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李解放忍无可忍，当众揭发了吴丹心。吴丹心是被荒唐政治环境毒害和扭曲的女性，可悲可叹，足可同情。

为什么现实官场会如此糟糕？一个简单的答案是，官场治理出了问题。为什么官场治理会出问题？我们没有共同信仰，没有共同理想，没有共同价值观，我们甚至对未来没有信心，没有希望。回到文学话题，我认为文学不能让给绝望，而应给人希望。当然，文学又不能虚假地制造希望。文学是不能空口讲大道理的，它要用形象说话，用艺术力量去影响人。

我的小说有温暖，有爱，因此是给人以希望的。《国画》里面，朱怀镜同梅玉琴的爱情，朱怀镜同记者曾偃和画家李明溪的友情，都是很温暖的。但有的

人无视这种普通人或小官员身上的亮色和他们温暖的人际关系，而批评这部小说太灰。或许，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身上的光亮和热度太微弱了。《桂爷》里面，写村长大发夫妻对老支书桂爷的关心也是充满温暖的，尽管桂爷无力抗御晚年困境而自杀。《苍黄》里面写李济运同老领导田家永的关系，那种形同父子的感情也有动人之处。《西州月》里，写关隐达同陶凡之间，那种既像上下级关系，又是翁婿关系的细微感觉，都是带着体温的。他们心息相通却无需点破，相互宽慰却并不言表，握手之间就能完成内心的交流。

谢谢大家！**新文学评论**

主持人语

◆ 陈晓明

2000年11月11日，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决出结果，《抉择》（张平）、《尘埃落定》（阿来）、《长恨歌》（王安忆）、《茶人三部曲》（王旭峰）四部作品榜上有名。按茅奖每五年五部作品的数额，这一年还有一部作品空缺。或者评委意见难以统一，或者难有令评委完全信服的作品，或者竞争激烈，旗鼓相当，难分胜负，故而只有暂付阙如。多年后，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还是站得住脚的，这几部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都有一席之地。

张平的《抉择》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时效性，这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观念所推崇的作品。这部作品发表后，产生了强烈的现实反响，尤其是改编的电影，据说高层领导和有关主管部门都十分赞赏，它为中国当时正在着手进行的“反腐败”提供了一个及时的参照系。《抉择》首发于文学杂志《啄木鸟》1997年第2期至第4期，1997年8月由群众出版社结集出版。随后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于2000年出品上映，上映后以1.7亿元创国产主旋律电影最高单片票房纪录。作为反腐败的重大题材和教材，当时每个单位都组织观看了这部影片。在如此背景下，如此有影响的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顺理成章。张平的作品一直坚持道义上的鲜明色彩，他早年的作品就有十分强烈的“人民性”。在《抉择》中，“人民性”这个概念被重新放置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背景中，它不再是在改革的层面上揭示经济制度的不合理，而是在政治层面上思考人民与当权者的矛盾。尽管这部作品是被冠以“反腐败”的代表作，但其中对人民的重书写还是这部作品值得肯定的地方。这部作品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底层民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逼真的现实主义笔法足以催人泪下，人民开始有勇气与

权势者斗争。这些描写可以看出张平情真意切，对底层普通百姓有发自内心的关切，可以看出他早年表达的那种“人民性”具有更广阔的内涵。今天我们在艺术上掂量它，或者置疑它在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的文学传统下，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可能并不是完全的历史主义态度。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就是对现实主义状况做出及时而真实的反映，它的问题性和当时性，它的尖锐性和直接性，都使它不可能在艺术上有更为复杂的设计，但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下，它的现实意义就可以使之具有独特的意义。尽管我本人崇尚“纯文学”，但面对书写现实的作品，我也会看到文学多元并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阿来在出版《尘埃落定》之前默默无闻，《尘埃落定》让阿来名满天下。这部作品显得气韵灵动，故事叙述从容却跌宕起伏，语言绚丽却不失洗练。这部小说可以说是史诗式的格局，写一个土司家族的兴衰史，也是发生在地缘区域里的争斗史。小说把这段家族史放置在巨大历史变异的时间段落中，即西藏从前现代的农奴制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前夕的时期。小说并没有过多表现外部历史对西藏历史的介入，而是表现他们自身对外部社会的反应，他们内部的争斗，家族内部和土司之间的争斗。这一切，都因为傻子的视点而被改变，历史呈现为一出戏谑的和略显荒诞的舞台剧。这部小说把大历史与小视点结合得恰到好处，相当于四两拨千斤。这部小说因为采用了傻子的叙述视点，不仅显得自由洒脱，而且几乎是神采飞扬，无拘无束，出神入化，浑然天成。真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因为傻子的视点没有限制，在叙事上可以超越常规逻辑。反复重演的家族争斗，到了现代革命时期，历史不得不耗尽了它的重复逻辑。麦其土司一家

人在解放军到来时终归于灭亡，傻子最终为仇人所杀，那鲜红的血流了一地，但依然没有痛苦，像是期待已久的结局。就此而言，这部小说以史诗的形式，完成了对经典史诗的解构。不难看出这部小说的叙述深受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影响，也可以看到苏童的《罍粟之家》的那种情绪和风格。但阿来确实做得颇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是藏文化的神奇底蕴在起作用。

1995年，《钟山》第2、3、4期连载王安忆的《长恨歌》。《长恨歌》讲述一个女人荣辱沉浮的历史，但并不渲染惊心动魄的大喜大悲，而是在平淡安详中叙述上海的小弄堂的日常生活史，女人在这种生活史中完成了她的宿命般的人生。王安忆曾经表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日子。”^①她理解的历史因而是一种日常的生活史。《长恨歌》延续并推进了王安忆在“三恋”中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其中也始终隐藏着男性历史对女性日常性的压迫。王琦瑶只想过“好生活”，男人改变了她的生活，实则是男性历史摧毁了她的生活。革命改变了一切，也随时都可打碎她的日常生活。她小心谨慎地回避着这个男性历史中的强大暴力，但那被男性创造出的历史动力，终究会侵扰她的生活。她最终被一双男人的手掐死，而这双手，虽然没有以革命的形式扼杀她，但却以对金钱的贪婪掐死她——这倒是与老上海一脉相承，如同老上海幽灵重现。老上海的怀旧与弄堂里的日常生活，王安忆是在重写海上旧梦，无意中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自我重构给予了文学的铺垫。

王旭峰原来研究历史，倾10多年心血，完成《茶人三部曲》。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厚重的历史小说，虽然并非艺术上特别富有创新性或挑战性，但它对现实、历史或人性的表现还是有相当深刻独到之处的。它的文化底蕴厚实，关于茶的专门知识极为丰富，况且以它的历史和生活的含容量，这部作品获奖也无可厚非。事实上，这部作品在构思上还是相当大气的，也颇具匠心。它把三个层面叠加在一起，即把家族的历史、茶文化、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变动三者穿插结合起来，倒是把中国的历史叙事和家族叙事发挥到极致

的地步。这部作品也写到众多的人物，刻画人物的手笔还是颇具功力。一招一式都有江南韵致，一板一眼都有文化根底。

12年过去了，这里邀请我的几位在读博士研究生来撰写评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接近这几部作品，为求对每一部作品深度解读，故在有限的篇幅里，每篇文章主要讨论一部作品。龚自强评论张平《抉择》，对作品的总体把握很到位，他也很用力，自强用功，写作能力颇强。关于这部作品他有一个地方分析得很见地，他看出小说表现的“抉择”的困难，并非全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经常是官场中陷入人事关系，个人的利益权衡而陷入“抉择”的困境。但恰是在这个地方，自强没有深入探讨下去，他可能有些偏爱这部作品，对其有限性没有更多地展开探讨，例如，小说对不可决断性（抉择）的表现还是没有坚定地放置在大是大非的决断的绝境中来思考，这可能是这部作品值得反省的地方。

何瑛对阿来的《尘埃落定》的分析着眼于通论，就这部作品创建的“另一种史诗叙事”进行分析，角度、立意很好，拉开的结构架势颇大，但关键的要点没有形成一个不断深化的主题。文章涉及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以为是很有价值的，文章谈到“作者实际上是用土司之间的争斗这种民族内部冲突置换了革命和现代性冲击的命题；同样的，小说也以宗教文化的神秘性力量解释了现代性力量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介入”。这部小说试图碰撞两个主题——革命携带的现代性与西藏进入现代的冲突，但却并不直接表现。同样，对文化神秘性的表现兴趣压倒了对不同文化，乃至政治对信仰的冲击。显然，这两个要点是“硬道理”，阿来如何处理这两个问题，它们是可以被追问并形成问题链的。但何瑛看到了“在《尘埃落定》中，革命的意义模糊不清”，如何模糊不清？只是点到为止，但这是要害问题。如何评价它的处理方式？是合理的、创造性的，还是回避式的（回避或许是叙事策略）？何瑛也指出：“后台的力量在小说中不经意地闪现，直至在小说最后显示出摧枯拉朽的力量，藏族和土司制度的主体性在命运般的强大力量下轰然倒塌，终而尘埃落定。”如何重写革命，阿来几乎避开了《农奴》的经典叙事，但神秘文化和异域风情能否真